

● 皖江文化研究

梁朝以来池州昭明太子信仰的建构与发展

丁希勤, 宫梦蝶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池州昭明太子的衣冠冢和庙建立于梁朝,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建构昭明太子信仰的地方。它是在梁武帝的皇储制度引发战争危机的情况下,池州地方上为保境安民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池州昭明太子信仰形成于梁朝,发展于唐朝,兴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明清以来与广大城乡庙会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官民互动、祭神演剧的娱乐行为。

关键词:梁朝;池州;昭明太子;民众信仰

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1)04-0026-06

收稿日期:2020-12-20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1.04.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历代帝王神话研究”(19BZS150)。

作者简介:丁希勤,男,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宫梦蝶,女,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安徽池州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建构昭明太子信仰的地区。据相关记载,梁朝昭明太子死后葬在南京上元县安宁陵,而衣冠冢却在池州的贵池县,“历来方輿记载皆系太子陵于贵池,是梓宫兆域竟失其真,独此衣冠一抔土没世不忘。”^{[1]卷五}昭明太子本人与池州的关系现已无从考证,池州的昭明信仰是民间建构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军事战争、政治建置、祀典制度、城乡庙会等方面,展示了梁朝以来昭明信仰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情况。目前学术界对昭明太子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领域,而对历史与民间信仰中的昭明太子研究较少。池州有昭明太子信仰的生动案例,对其进行发掘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梁朝贵池昭明太子信仰形成的原因

昭明太子出生于南齐中兴元年辛巳(501),死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贵池《秀山志》记载:“梁大同三年(537),石城土庶请太子衣冠卜兆于秀山。”^{[1]卷五}并立庙以示纪念。“石城”即今天池州贵池县,其衣冠冢的建立,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认为神托梦于此地。元代钟世美《郭西昭明庙记》:“昭明既殡,梁亦旋亡,其神附于秀山之民曰:吾昔爱此,今帝锡此于我矣,尔民既祀我,我其福之。于是民相与筑祠于秀山之阿。”^{[2]卷九二}、认为昭明太子

生前曾在此地游玩。《秀山志·序》:“昭明太子性爱山水,常嗜游于此,秀山遂名闻江左。既而上帝锡命,土庶翕然从风,请衣冠建陵庙。”^{[1]卷首}“昭明太子尝嗜游焉,后人葬其衣冠于此。”^{[1]卷五三}、认为贵池是昭明太子食鱼之封地。明代桂鏊《修西庙记》:“大抵梁主未受禅时为相国,经营王室,过清溪而有食鱼美贵池之封。”^{[3]卷七}方谟《重建昭明太子殿碑记》:“昭明至秋浦,食鱼美,因名贵池,后遂以名邑。”^{[2]卷九}五代杨吴政权时改秋浦为贵池县。四、认为是招魂之举。桂鏊《修西庙记》:“亦或诸王子如勃如督都江陵、镇广州时,隐痛于前星蚀采之后,拭泪于缥囊绣囊之余,怵惕霜露,凄怆寒烟,所至立此遗迹以寓招魂感通之忱。”^{[3]卷七}也有持以上综合说的,如元代钟世美《郭西昭明庙记》:“因观旧志以问诸水滨,皆谓梁之昭明昔在秋浦食鱼之美,号其地曰贵池。然性爱秀山之胜,屹然数峰矫于云表,清溪环合为一洞天,土地饶沃,人愿而质,常徘徊久之。异时,昭明既殡,梁亦旋亡。其神附于秀山之民曰:吾昔爱此,今帝锡此于我矣,尔民既祀我,我其福之。于是民相与筑祠于秀山之阿。”^{[2]卷九}

上述几种说法难免有猜测和附会的成分,未尽符合史实,如清朝贵池人刘廷銮《文选阁记》记载:“元以来诸碑碣皆据《梁书》《南史》为文,以昭明未尝莅池,而池有昭明诸迹,如钓台,如香鲫荡,如隐山寺手书额,如花园,累累显著。或即梁武未

受禅所为,误以相属。或诸王子勃督等之国所经,追先饮痛,立此遗迹以寓招魂。此所谓求其说而不得者。”^{[1]卷七}其实昭明太子衣冠冢的建立与梁代贵池的地缘政治有关,是当时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

贵池衣冠冢和秀山庙建于梁大同三年丁巳(537),与昭明太子生于南齐中兴元年辛巳(501),同是巳年,地点在当时的石城县治秀山。《秀山志》:“秀山距金陵不五百里,为六朝畿辅地。”^{[1]卷五}“秀山之麓有秋浦县旧址,秋浦即汉石城地。”^{[1]卷二}当时的石城县是梁朝皇畿西头的一个军事重镇,“池州时称石城邑,属宣城,宣城实梁武帝初封梁国国内郡也,史或止以畿甸视之。”^{[1]卷七}明末吴非《汉石城废县记》记载:“《梁书》封大款石城公,侯景之叛,矫诏遣石城公为质,解外援军。迄简文立,封石城公为江夏郡王。《陈书》顾溯称,前宁远石城公外兵参军,王位以垂文,梁诸王多为宁远将军……则皆今贵池地也。”^{[3]卷八}东汉末年,南京城西有座军事要塞曰石头城,亦曰石城,《江南通志》称“石头城在上元县”。据《梁书》记载,昭明太子死后也安葬在上元县,说明昭明太子墓葬与石头城在同一县。贵池的石城县与之同名,因此埋藏昭明衣冠冢有效法彼处之嫌疑,但却彰显了贵池显赫的军事地位。

石城县处在宣城郡与豫章郡之间。池州古有六县:贵池县(石城县)、青阳县、石埭县、建德县、东流县、铜陵县。乾隆《池州府志》记载:“汉、晋、宋、齐、梁、陈、隋之间未立池州,诸县外附他郡。”“东流县,汉豫章郡彭泽县地,六朝因之。”^{[4]卷一}“丹阳(即宣城郡)入斗十六度,贵池、青阳、铜陵、石埭属焉。豫章入斗十度,建德、东流属焉。”^{[4]卷二}说明当时池州的东面属宣城郡,西面属豫章郡,而石城县处在宣城郡与豫章郡之间。

豫章郡是昭明太子的长子欢的封地。《南史》记载:“(昭明)薨后,长子东中郎将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誉封河东郡王,曲江公察封岳阳郡王,譬封武昌郡王,鉴封义阳郡王,各二千户。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仪,唯别立金华宫为异。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噂语,故各封诸子大郡以慰其心。”^{[5]1312}昭明诸子的封地基本上是自豫章沿长江一线向西分布。

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长子,长子既亡,按理应由嫡长孙继承皇统,但梁武帝废嫡立庶,扶植简文帝,出嫡长孙欢为豫章郡王,当时引起昭明一系的

强烈不满。《南史》记载:“先是人间谣曰:‘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当开复未开,使我心徘徊。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云帝哭也。欢前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书舍人臧厥追欢于崇正殿解发临哭。欢既嫡孙,次应嗣位,而迟疑未决。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欢止封豫章王,还任往。谣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复还徐方之象也。”^{[5]1313}宋代《赤城集》:“昭明薨,梁武帝欲立欢为太子,以国难未平,不可以传少主,乃封昭明诸子悉以为王,图慰其心。督遂进位岳阳王,为会稽太守。督以兄弟不得嗣居,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乃蓄积宝货招致宾客,归附者数千人。”^{[6]700}

为了防止豫章郡王及其兄弟造反,昭明太子死后次年即中大通四年(532),梁武帝封简文帝长子大器为宣城公,又封简文帝第三子为石城县(今贵池县)公。《南史》记载:“临川王大款,字仁师,简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县公,位中书侍郎,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萧绎)承制,改封临川王,魏克江陵遇害。”^{[5]1340}大同二年(536),又封简文帝第四子为宁国县公,简文帝第五子为临城县(今青阳县、南陵县)公。这些都是简文帝的势力,密集分布在宣城郡与豫章郡之间,显然是针对昭明一系的动作。也就是说,贵池当时处在简文帝的势力范围内,但又与豫章郡搭界,双方都是皇位的继承人,剑拔弩张,一旦爆发战争,贵池首当其冲。因此,大同三年(537),“石城士庶请太子衣冠卜兆于秀山。”搬出昭明太子作为保护神,以图缓和来自昭明后裔的威胁。

大宝二年(551)八月,侯景攻入建业,废简文帝,矫诏禅位豫章王栋,亦即豫章王欢的儿子,昭明太子的孙子。次年十一月,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即位于江陵,杀昭明第二子萧誉。昭明第三子岳阳王督以兄被杀,投靠西魏。西魏派兵攻打江陵,杀萧绎,以萧督为梁主,梁朝的半壁江山很快落入昭明一系的手中。贵池因事先祭祀昭明太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战争的蹂躏,无疑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二、唐朝池州的建置与昭明太子信仰的发展

到唐朝时,昭明太子的保护神形象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昭明太子出生于南齐中兴元年辛巳(501),贵池太子衣冠冢与秀山庙始建于梁大同三年丁巳(537)。唐武德四年辛巳(621)始置池州于秀山,后废。至永泰元年乙巳(765)复置池州,同年又于郡城西门建立西庙,都是发生在昭明太子的本命巳年,表明昭明太子的土主形象在唐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由贵池之神发展到池州之神。

池州在唐代有两次建置,始置于武德四年(621),当时正发生战争。《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杜伏威)遣其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又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寻闻太宗平刘黑闥,进攻徐圆朗,伏威惧而来朝,拜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于京师,礼之甚厚。”^{[17]2268}又云:“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置宣州总管府,六年陷辅公祐,七年贼平,改置宣州都督,督宣、潜、猷、池四州。”“池州,隋宣城郡之秋浦县,武德四年置池州,领秋浦、南陵二县。贞观元年废。”^{[17]1603}可见,池州的建置是战争的需要。至贞观元年,天下平定,池州也就被废。

复置于永泰元年(765),也是战争的需要。《旧唐书》记载:“李芑,字茂初,赵郡人也。永泰初,转兼殿中侍御史。时宜饶二州人方清、陈庄聚众据山洞,西绝江路,劫商旅以为乱,芑乃请于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谋。李勉然其计,以闻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池州焉。”^{[17]3654}同年,在郡治西门建西庙祭祀昭明太子。清舒廷交《秀山文选台说》:“唐永泰年徙县今治(贵池),特建庙于郡城秀山门外而曰西庙,既有庙,亦设文选阁,有花园,有钓台以妥灵焉,此踵事增华而为之。”^{[1]卷七}显然是以昭明太子作为保护神。

可见,唐代池州的两次建置都发生在战争环境中,都发生在昭明太子的本命巳年,始置在秀山庙,复置时建西庙,都是围绕昭明太子而展开的。返观梁朝衣冠冢的建立,也与当时的政治和战争环境有关,是当时安保思想的产物,用秀山庙建立时昭明的梦话说就是“尔民既祀我,我其福之”。

池州始置于武德四年,废于贞观元年,贞观二年(628)贵池建立祝圣寺。光绪《贵池县志》记载:“景德寺在府治北,旧名祝圣寺,唐贞观二年僧雪窰建,宋景德二年赐今额。明隆庆间移至毓秀门内,而以寺基立府学。按贞观二年,池州先一年废,而后建寺。”^{[3]卷九}可见,祝圣寺建立于池州废置的次年,到明代又在寺基上立府学,目的主要是为池州纳祥祈福,与昭明衣冠冢的保境安民思想是

一致的,因此成为昭明庙会的重要祭祀地点。《秀山志》:“例于每年八月十二日预迎圣驾,守令率诸僚属诣郭西祠,启圣筮仪,鼓乐,洒道,焚香,至祝圣寺驻蹕,装扮各神,敬赛圣会,十五日郡邑诸当事齐集致祭,十八日仍如前送回西祠安奉。”^{[1]卷五}“是日有司祷祝毕,导昭明像,凤盖华旗,辇御郡景德寺,若法驾然。十五日是其诞辰,景德寺故其外家地也。”^{[1]卷七}

三、宋明以来池州昭明太子信仰的兴衰

池州昭明太子信仰形成于梁朝秀山庙之建立,发展于唐代郡治西庙之形成,兴盛于宋代朝廷之册封神学,毁于元末兵燹。明清时期大正祀典,虽有小规模的修建,但总体上趋向衰落,明末清初衰败尤为严重。

唐宋时期有多次的册封,是昭明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乾隆《秀山志》记载:“唐代宗置郡立庙,其封失传。宋初榜曰昭明,哲宗元祐间赐额文孝,徽宗崇宁间封显灵侯,大观中加昭德公。南渡后建炎间封英济王,绍兴初加忠显,后又加广利。乾道九年(癸巳)加灵佑。嘉泰元年(辛酉)去广利,封文孝英济忠显灵佑王。”^{[1]卷四}南宋初年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今池州郭西英济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开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孙今分为八家,悉为祝也。”^[8]明成化间方谟的《重建昭明太子殿碑记》:“若庙治兴废,历代虽未能悉考,邑载有丽景楼、文选阁、庙之殿庑堂,堂多至百余间……自昔香火亦弥盛矣,元季悉毁于兵。”^{[2]卷九}

明初大正祀典,池州的昭明太子庙进入祀典中,朝廷定期遣使祭祀。光绪《贵池县志》记载:“洪武三年厘正祀典,仍号昭明太子庙,嘉靖以前岁遣中官秋仲诣庙祭告。”^{[3]卷七}进入祀典和遣使脩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池州昭明信仰的复兴。

首先,表现为昭明庙的修建。清朝刘廷奎《文选阁记》:“(郭西昭明庙)及入明朝,洪武、正统、天顺、弘治、嘉靖凡六七修,门寝壮丽,比诸闕宫,貌以沉水香肖之,自梁武、丁贵嫄、简文元帝、蔡妃、豫章、枝江诸王及诸侍从官僚、释宝志、傅大士,各肖一像,别从其寝,不同室而受藻蘋,不共牢而享牲醴……庙门前寝殿三里许,画栋雕楹,飞甍杰宇,列卫长廊,深达重庑。斋祀有庖,展谒有室,丹雘赫然,翬张鳞次。文选阁贮文选楼版,远近荐馨无虚日,不啻武当九子补陀。”^{[1]卷七}

其次,表现为昭明庙产的兴办。当时西庙“有香灯田四则,一港西田八亩,明弘治间知府祁司员置。一册田七亩三分,万历间郡推秦懋义置。一册田三亩零七厘,僧普秀置。一册田四亩二分,僧通济置。又,庙后山一号。”^{[1]卷七}计西庙有二十二亩田产和一个后山。秀山庙,“按明永乐后碑文内开秀山祖殿、住基山场,计官山一十八亩四十八步,其所包乎山之外者甚广。”^{[1]卷五}

明朝中后期,池州的昭明信仰开始走向衰落。

首先,表现为嘉靖年间朝廷停止谕祭。《秀山志》记载:“贵池以鱼美得名,其鱼以香鲫为最,因名其产处曰香鲫荡。鱼味馐馥异常,土人呼为沉香鲫。往时中使致祭还朝,必取以献,然不可多得,渔人或以为累,司徒孙仁请止之。自停谕祭,香鲫不复生。帝王之福,神圣之灵如此。”^{[1]卷二}

其次,表现为寺庙田产的萎缩。如秀山庙的山场由明初的一十八亩四十八步,到“正德初,郡守白翱牒给二僧看守,不及本山之什一,山以外置之不问。明末时邑令史鸣皋审判立案,至今成为定宪。”^{[1]卷五}“秀山先年官山既广,捐输田亩复多,庙祝得以食其余利,迨牒给二僧看守时山仅什一,田无勺土,幸食指寥寥,可以托钵自给。迩来沙弥繁衍,食指难供,相率为耕凿计,锄他人田亩者历有年所。始自明成化间孙司徒仁置香灯田一亩零,至康熙丁酉寝陵构讼,僧典鬻以充糗粮。雍正二年,孙司徒仁后裔率众复动支宗祠公帑赎回原田归之祖殿,存庙产之几希,续香烟于欲断,其功诚不可泯。”^{[1]卷五}李鸣皋,“贵池令,崇祯甲戌捐修秀山殿宇,闻豪有冒托施主侵占者,史侯乃秉公严勘断回侵地,聿按豪罪。”^{[1]卷六}康熙五十六年,“复有民人王某觊觎陵荫,因饵附生员张○○勾党侵伐”^{[1]卷七},时任池州太守李英,“因秀山讼事细加察勘,虚衷剖断,乃复为之记,勒石秀山祖殿及郡治西门行祠中,则昭明陵寝得以存其旧址者,皆公之力也。”^{[1]卷六}

最后,表现为昭明庙的衰落。清朝刘廷奎的《文选阁记》记载:“(郭西昭明庙)嘉靖后江西巨商私致祷,刎神元首以去。僧虽补其缺略,然非沉水香,庙貌亦自是颓不复振,半归藁莽间。宋勅藏周祝帷幕上,天启七年燬焉。”^{[1]卷七}万历三十七年吴非《西郊游记》:“西过圣母桥,亦称西湘,西望墙垣○○,石柱屹立,横一木藤萝,蒙密于风雨中者,梁昭明太子庙也,旧椽题楔,额倾颓尽,而柱石卒不摇,相传为公输班神助云。西及庙,庙所以祀昭明也

……丛树茂密,荒冷静深,若欲移人性情者。”^{[2]卷九}崇祯七年,昭明祠又发生火灾。明末李学沆有昭明诗,自注云:“家君令兹邑,犹及见唐宋以来诸浩勅,甲戌毁于火,荡无复存,因以志慨。”^{[1]卷六}

进入清代以后,西庙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兴修:康熙十九年太守喻成龙修庙,乾隆四十三年知县林梦鲤重修,道光五年漆日榛重修。秀山庙也多次重修,但仍难挽整体的衰落趋势,甚至出现个别庙宇被其他信仰侵占的现象。如光绪《贵池县志》记载:“(罗刹矶)一名太子矶,在城西六十里,按此祠相传为昭明太子像,俗呼哪吒太子。”何经文《太子矶庙辨》:“池之西为李阳,中流一矶屹立,傍有高台杰阁,题曰太子庙。昭明有功文教,后人祠而祀之,理固然也。何人不知所考,因其矶名罗刹,竟传为佛乘中哪吒太子,遂借伊蒲塞之僮,嗟乎!”^{[1]卷四}宁以麟亦云:“余昔乡试,舫舟南岸,谒庙谓所祀者昭明也。(今)整冠瞻拜,英武少文,询阁中像复振甲提戈,意殊错愕,僧为言历祀哪吒太子。”^{[1]卷七}

四、明清池州的昭明会与昭明太子信仰的变迁

池州旧有昭明会,分官方和民间两种情况。官方一般在八月十五至十八日举行,《秀山志》“乡城胜会”记载:

圣帝生于九月,池俗向以中秋日庆祝,即前朝差中使挂幡谕祭亦于是日。后因中使不能奉命惟谨,而或有扰累,邑绅孙司徒仁请停其遣,檄令府县正印官躬行祭享。例子每年八月十二日预迎圣驾,守令率诸僚属诣郭西祠,启圣盥仪、鼓乐,洒道焚香,至祝圣寺驻跸,装扮各神,敬赛圣会。十五日郡邑诸当事齐集致祭,十八日仍如前送回西祠安奉。各乡之聚族而居者报赛时迎入宗祠,张筵演剧,或一昼夜,或三五日。乡之东曰接案,乡之西曰朝会,各有定期,从无更改。自秋仲至冬徂无虚日,其敬奉如此^{[1]卷五}。

又云:

八月十二日,郡人多戴面具,锥肱刺械,引颈贯刀,幡幢羽葆,穷极绮靡,号为七圣二郎,其余城社及一二百里外乡曲丛祀土木偶,莫不與至稽首昭明庙以迎神。是日有司祷祝毕,导昭明像,凤盖华旗,辇御郡景德寺,若法驾然。十五日是其诞辰,景德寺故其外家地也。至十八日,有司以下送神如前仪^{[1]卷七}。

《杏花村志》:

池人以八月十五日为昭明诞辰,先期十二日知府

率僚属迎神像入祝圣寺,十五日躬致祭,十八日送还庙所。盖贵池里社无不祀昭明为土神者,或朱麓飞栋,或数椽栖神,或片石筑坛,水旱必祷,灵响异常,诚福主也^{[1]卷三}。

官方昭明会的迎神路线始自西庙(西祠),次至行祠,再至景德寺,然后回西庙。《秀山志》:

西庙在城西四里,唐永泰初以秀山远于郡治,遂建西庙祀昭明太子,有坊有重门,有堂殿寝廊,有钟鼓楼,規制壮丽,拟诸宫阙焉。

行祠在郡城西通远桥北,原有祠址,郡守祁司员重建。正德庚辰郡守何绍正迁秀山门内,榜之曰昭明行,每岁秋赛合郡官僚诣郭外西祠列卤簿迎神入城,先于此祠税驾,然后升龙车凤辇至景德寺庆祝焉。

景德寺,旧在郡治北,原名祝圣,唐贞观初僧雪窦募建。宋景德二年赐额景德。明隆庆间移置今处,仍称祝圣。每年中秋前三日迎太子圣驾至寺祝寿,中秋后三日始送回西祠^{[1]卷二}。

明万历年间吴非的《池州迎昭明会记》记载:

池故事以八月十五日为梁昭明千秋,其朔遣耆老一人○○杖骑而告庙,谓之列马,郡县有司则以前三日躬迎神貌于郭西庙,入郭内祝圣寺而礼之。是日诸家扮会迎神者,所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其扮也,则各骑乘奉面具,或于东门之桥,或于南门之狮子口,盛妆饰仪从。惟七圣则用机械引刀、穿颈贯腹,而各以旗旛鼓吹导之,步梁昭明攀于西门外杏花村之马站坡,而骑乘以还游于通市。或及郡县之公堂,薄暮而毕,脱面具以交于明年之扮者,无扮者则归之庙。其妆饰仪从多自为新制,僦而旧者偶一见之。其未扮也,以是月朔启面具于家,鼓吹喧日夕,诸知交时过从为助喧,至出会日而罢。有至十八日之晡而罢者,如雨不克会则待为改期,而迎昭明期不改。诸扮关壮缪者必长夫之属,扮城隍者必马户之属,扮七圣、二郎、玄坛者则郡县胥役豪猾有力之徒,不则亦市俗屠门也。所扮之人有自四五岁以至四五十余者,诸所扮之神有复之至再至三者。宋郭西有神曰九郎,九郎即昭明,见陆游《入蜀记》,黄庭坚亦云池人祀昭明为郭西九郎。或曰二郎、七圣合之正谓九,或又曰七圣为兄弟,而二郎以两神收制之。或直据西游记为考,皆不可据。诸一人所扮之费有几二百金者,有少至二十余金者,要所从来相沿已久,始在池口二郎庙前掘地得面具。池口所扮以十二日集于郡,以十五日游于池口,是日举市欲狂。余尝寓于郡邸览观之,其后当事裁夫马而关壮缪、城隍之会废不兴,非有司禀礼奉法禁之也。今年有友人来邀,余曰是不必览观,

亦不必不览观也,乃记之^{[2]卷九}。

文中讲到昭明会,“诸家扮会迎神者,所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对其含义和九郎之由来介绍了当时人的看法,认为“皆不可据”。元代钟世美《郭西昭明庙记》也对九郎提出了疑问:“昭明,武帝长子也,世以九郎为称,盖不知其何故?而泰山亦以纪之,岂非功德及民,登侯于岳?则所谓九郎者,其泰山以郎序诸神之号耶?”^{[2]卷九}其实,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昭明太子出生在辛巳年,辛属金,葬在贵池西边,立于西庙。另外,昭明太子信仰佛教,佛从西来,所以昭明居卧皆向西面。《梁书·昭明传》:“(昭明太子)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元代钟世美《郭西昭明庙记》:“坐必西向,卧必面台。”乾隆《秀山志》:“(昭明)陵不可南面而西向,与太子生居东宫坐起恒西向之意适合。”易学上,西五行属金,金数是九,《河图》:“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因此称昭明太子为九郎^[9]。金需火炼,火数是二和七,《河图》:“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为二郎和七圣之由来。而关壮缪和玄坛是关公和赵公明,二者都是财神,也是金性。城隍代表土地,土生金。所以,它们的组合以昭明太子为中心,是对财神的一种扮演。

吴非《池州迎昭明会记》原文标题下有清康熙年间郎遂的注释:“遂注记于赛会迎神事甚详,而实始于西庙,故入之,今成废举矣。”吴非也提到:“余尝寓于郡邸览观之,其后当事裁夫马而关壮缪、城隍之会废不兴。”说明明末清初池州官方的昭明会衰落了。尽管如此,池州民间的昭明会还是比较兴盛的。乾隆《秀山志》记载了当时“乡村朝会”的盛况^{[1]卷七}。

根据光绪《贵池县志》,清朝贵池县共有10个乡,辖33保。上述乡村朝会涉及到其中4个乡的9个保,规模不是很大。其中,舞(鸾)上乡在县西90里,舞(鸾)下乡在县北50里,兴仁乡在县西南120里,兴孝乡在县南220里,表明昭明会主要分布在贵池的南面、西面和北面。根据旧志记载,秀山庙在贵池西边七十里,西庙在西边四里。这一分布是沿秀山庙至西庙一线向南和向北顺秋浦河辐射的结果。《秀山志》:“帝子生而流连兹土,歿则福庇吾民,迄今环浦水居者上下百十里,自八月朔至孟冬后,焚香顶祝,歌舞管弦之声不绝于道,固万家佛云。”^{[1]卷七}从上面可以看出,乡村庙会一般从八月十四日延续到十月一日。也有抵至除夕的,“迄今间巷村墟之间,庙貌如鳞,凡水旱疫疠,往往显灵

呵护,居民每岁报赛,演剧娱神,起仲秋,讫除夕不绝。”^[1]七个个别乡村也有在正月十五和五月初八举行昭明会。

五、结 语

池州昭明太子信仰形成于梁朝贵池衣冠冢和秀山庙的建立,是在梁武帝的皇储制度引发战争危机的情况下池州地方上为保境安民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与当时池州的地缘政治和军事位置有关。历来认为池州是昭明太子的封地,昭明曾游贵池,爱其山川之美,爱食贵池之鱼,并有昭明钓台、文选楼等一系列故事,这些在正史中均不见记载,是唐宋以来民间附会的结果。唐朝池州的两次建置都是围绕昭明太子而展开,且都发生在战争环境中,当是梁代安保思想的延续。宋元时期江南社会不稳定,朝廷积极发挥神道设教的功能,屡颁封赐,使池州的昭明太子信仰获得较大的发展。明清国家大正祀典,池州的昭明信仰成为官方祭祀制度的一部分,其信仰开始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情况。嘉靖以后官方的昭明信仰开始衰

落,秀山庙、西庙、官方庙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而民间的昭明信仰逐步兴盛,“闾巷村墟之间,庙貌如鳞。”昭明太子信仰逐渐从高层走向乡村社会,从官方祀典走向民众的自娱自乐行为。不少乡村都有昭明会,主要分布在贵池的西边秀山庙至西庙一线以及秋浦河沿岸,是广大民众每年例行的一种祭神演剧的娱乐活动。

[参考文献]

- [1]陈竑.秀山志[M].刻本,1915.
- [2]朗遂.杏花村志[M].刻本,1920.
- [3]陆延龄.贵池县志[M].刻本,1883.
- [4]张士范.池州府志[M].刻本,1778.
- [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林表民.赤城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
- [7]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张邦基.墨庄漫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82.
- [9]丁希勤.古代徽州和皖南民间信仰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00.

责任编辑:徐希军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lief of Prince Zhaoming in Chizhou Since the Liang Dynasty

DING Xiqin, GONG Mengd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Anhui)

Abstract: Chizhou Zhaoming prince's tomb and temple were established in Liang Dynasty, which is the early place to build Zhaoming prince's faith in Chinese history. It is a kind of emergency measure adopted by Chizhou to protect the territory and the peopl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war crisis caused by the crown prince system of Emperor Wudi of Liang. The belief of Chizhou Zhaoming prince was formed in Liang Dynasty, developed in Tang Dynasty, flourish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declin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has been combined with the vast number of urban and rural temple fairs, and become an entertainment behavior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ods.

Key words: since the Liang Dynasty; Chizhou; the belief of Chizhou Zhaoming prince